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丁德科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 纳“仁”入“礼”, 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 进而以仁礼学说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 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孔子的“德治”思想, 经孟子、荀子等形成体系, 至董仲舒、司马迁臻于成熟, 成为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论。

[关键词] 中国古代思想史; 孔子; 仁礼学说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3)02-0084-06

Confucius' Guiding Principle in Rule of Virtue: The whole world submitting to Benevolence

DING De-ke

(Economics and Finance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Confucius regarded “benevolence” as the basic domain of Confucianism, and brought it into “rites”, thus establishing a doctrine combining benevolence with rites. Guided by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and rites, he further put forward his guiding principle of “rule of virtue” featuring the idea that the empire should be subjected to benevolence. He advocated that the system of rites of the Western Zhou should be restored, and a progressive feudal monarchy with ritual and musical civilization in natur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merge and un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stressing the rule of virtue, developed into a system by Mencius and Xunzi, became mature in the times of Dong Zhongshu and Sima Qian, and therefore was pursued as the country-running theory by the feudal monarchy.

Key words China's ancient thought history; Confuciu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and rites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 纳“仁”入“礼”, 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 并以此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 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封建君主政治。

一、孔子的仁礼学说

“仁”^[1] 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孔子看来, “仁”是自然、人和人的社会的本质和法则、准则。《易传》中说, 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本质是“仁”, “仁道”是“经纶天下之大经”, 是治理社会的根本方法。这就是孔子讲“仁道”且重行的原因。人与天、地同属客观存在, 人

同样是“生生不息”的, “仁”无疑也是人的本质。他说: “仁”不远人, “为仁由己”(《论语·颜渊》^[1]), “我欲仁, 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如何奉行“仁道”, 需心存戒慎, 时时自省, 使言行不违“仁”, 从而达到“从心所欲, 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仁者境界。

“仁”最基本的内容是“孝悌”。孝悌是儒家伦理的根本内容。《论语·学而》中孔子谈到孝悌的地位和作用时说: “其为人也孝弟(同‘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按照孔子所言, 孝悌是“仁”的品德中根本的内容, 君子致力确立这个根本, 就确立了治国和做人的原则。显然, 这是从政治的大处着眼, 把孝悌看作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为基础的、最

[收稿日期] 2002-01-20

[作者简介] 丁德科(1962—), 男, 陕西铜川人, 历史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后。

为根本的条件。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根本,也是“仁”的标准,“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以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王夫之一针见血地说:“礼者仁之实也。”蔡尚思先生认为:“王夫之此说比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还要高明。”^[4]这就是说,“礼”以“仁”为思想基础。孔子希望社会成员都能做到“仁”,其根本是“礼”,并且提出了方法上的指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欲”被孔子称为“恕”,所“不欲”即是“忠”,所“欲”与所“不欲”两者,相互统一,互为补充,构成了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论语·里仁》),是调整人际关系的一条根本原则。修己且推及于人,是孔子仁礼学说的原则。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少言言切。“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切”(《论语·颜渊》)。“仁道”要求人不乱发言,深思而后言,重要的是词能达意和说话的效果。其二,“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克己复礼”。老子认为自强者强于人,胜己者胜于己。孔子也有此观点,认为要做到“仁”,首先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克己”就是要努力从自身做起,而且“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复礼”就是要恢复周礼,按周礼的要求做。孔子还认为颜回“三月不违”(《论语·雍也》)的方式为“仁”,要弟子们学习效法,使“仁”得于心而存心奉行。其三,爱人。这是将“仁”推及于人。孔子对樊迟问“仁”做答说:“爱人”(《论语·颜渊》)。爱人就是要对他人仁爱。其四,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居处恭”讲持己,“执事敬”和“与人忠”关涉持己和及人。其五,恭、宽、信、敏、惠。恭、宽、信为持己之道与待人之礼。敏指行的态度,即重行,惠就是爱人,这五方面是持己及人的重要做法,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必须具有的德行。其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有志向且勤于学习,好问深思,就会有长进、有建树。这几个方面是孔子仁礼学说的主要原则,构成孔子所欣赏的代表“仁”性的人物形象。

“和”是“礼”之“用”,“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待人接物、处世治事,应以和为主,谦和谦逊。当然,这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过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过于谦和谦逊就是低三下四,就是自为卑下,也不合乎礼的要求。“礼”要有“节”,节制而不过头,所以“礼节”并称,即谦和谦逊要有严谨的态度,坚持基本的原则。“和”、

“温”、“良”、“恭”、“俭”、“让”、“敬”、“忠”、“信”、“敏”、“惠”、“刚毅”、“木讷”、“忠恕”、“中庸”等,是“仁”的内容和表现。这些都有个“节”的问题,要把握一定的度,做到“中和”。譬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蒞(畏惧)”(《论语·泰伯》)。“敬”不能出格,“敬”过于顺则使“人以为谄”(《论语·八佾》),过恭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之耻之”(《论语·公冶长》)。“忠”主要讲内心忠诚、忠实:“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与人忠,为仁”(《论语》)。对待人和事,重要的是心底里要“忠”,善待于人,认真于事。“信”指友朋之“忠”。因而,曾子有“为人谋而不忠乎”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的自省。可见,“中和”对“礼”很重要。故《中庸》强调人们做事要中和,符合自然规律:“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统一是礼的功用。“礼”的功用的最宝贵之处在于可以达到和谐。孔子“礼”论的精髓就在“中和”上。

孔子认为礼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有增有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论语·八佾》、《论语·为政》)。孔子特别把“礼”看作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集中表现,“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为此,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天下归仁”首先是全社会的事,是每个人的事:“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求诸己”,就是每个人以奉行仁为出发点,进而由对己的肯定推至对人的肯定,可见不约己是不行的。《论语·颜渊》还说:“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要求有对己的否定,甚至不惜生命,到最后,经过对己的否定达到对己的肯定而“成仁”。这已不是单纯地对一己的肯定,而是把一己肯定在与人和谐的仁礼统一的关系中。阮元说:“即可并人为仁”,此之谓也。正因为“君子求诸己”,所以孔子强调注意操守的人格理想。张岂之先生指出:“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该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崇高理想。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与生命发生冲突,只有选择前者,不能苟且偷生。”“有了这种操守,就能‘素其位而行’,‘人不知而不愠’,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发挥自己最大作用;就能‘中天下而立’,有铁肩担道义的气概,有敢于抗拒邪恶、扭转时俗的社会历史使命感。”^[3]

孔子仁礼思想的外延是广袤博大的,“仁”能推而“博施于民”、“济众”(《论语·雍也》)。与“仁”结合的礼是没有“不下庶人”的边界的。这使礼具有人民性的理论基础,也是孔子“天下归仁”的理论基础。孔子的“仁”“是有等级的博爱,而不同于墨子的无差别的兼

爱;这样就不能没有礼的层次来作为阶梯。孔子的礼义是以和为贵(即因差别而和谐)的秩序,与先前‘礼不下庶人’的原则不同,不能把礼当作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这样,礼是不同层次间的界限,又是桥梁,而这种桥梁恰恰就是仁”^[4]。孔子认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将仁能推而施于所有的人,就有可能都成为圣人(《论语·雍也》),这便达到孔子“仁”的最高境界。孔子探讨政治的起源,认为:社会规则都发源于人的情感与理性。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深信要使社会朝着更加完善的形态发展,关键是要提高人的情感素质和理性能力。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也是如此。儒家大同与小康两个社会理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那就是紧紧围绕着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品格的提升。为实现此目标,儒家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最重要的途径。这便是孔子冲破传统而兴办私学的原因。孔子要通过教育,使“礼”不但可用于贵族,而且使“庶人”也要讲“礼”,进而做官服务和影响社会^[3]。总的来讲,孔子仁礼学说是要有差别的全社会最大程度地知“礼”,从而“在差别中求和谐,在和谐中存差别”,实现以和为贵的秩序。^[4]这是孔子“天下归仁”纲领的主要措施和根本目的,包含有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内容。从认识论角度来讲,孔子“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论领域,创造了‘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和而不同’逐渐成为先秦时期儒家处理文化问题的一种主张”^[3]。也影响到其他学派和政治领域。其他学派效法儒家而程度不同地以“和而不同”来处理与其他学派的争论,互相吸取和完善;政治家及其政治集团运用“和而不同”来处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促进民族的融合和交流。正如儒家初衷,如果每个人、每个学术流派和每个政治集团都做到“仁”,都奉行“仁道”,“天下归仁”,那么社会就是一个讲究礼制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序、安定、进步、文明的社会,就是孔子所认为理想的社会。

二、“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仁礼学说指导下的“德治”思想,其基本观点是以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经世治国手段,追求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的。孔子“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

(一)以“礼”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

孔子认为周礼界定等级名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等级制度和地位尊卑观念,是西周礼乐文明盛世的根本性制度。因而,他的理想是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他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承认和遵守自己的地位和规范,下不能僭越,上不能自弃。如何建立、维护礼规定的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君主遵循并按照礼的原则治国,才是正确的、必然能成功的:“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八佾》)君主尊崇、遵循礼,“民易使”(《论语·宪问》);实行礼,到了和人心的地步,无君主也可以(《论语·八佾》)。臣是君之臣,必须以忠诚待君。“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忠”,就是“敬”(《论语·公冶长》),恭敬顺从;就是“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就是“以道事君”(《论语·先进》),能够用符合礼仪规范的正道事奉君主;就是“能致其身”(《论语·学而》),有献身精神,等等。“孝”是子对父的“孝”,同时也是为政者的选择和检验标准。孔子在回答是否“参政”问题时讲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认为尽“孝”就是参与了政治。他强调,君子之根本是“仁”,“孝”是“仁”的根本,“孝”的人不会有犯上作乱的毛病(《论语·学而》)。因而,君子应该“入则孝,出则弟(悌)”(《论语·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人兄”(《论语·子罕》)。

(二)坚决拥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中央王权

孔子“尊王”,即尊奉周王室,恢复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中央王权,建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体制,用来解决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以消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混乱无序,实现天下的太平与治理。因而,孔子赞美古代帝王效法于天、崇高伟大,赞美古代贤才良臣效忠国家(《论语·泰伯》);反对僭越违礼,视僭越为“不可忍”之事(《论语·八佾》);要求仁人志士要做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强调大臣要“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以道事君”(《论语·先进》),“能致其身”而不“犯上”“作乱”(《论语·学而》)。春秋及以后的战国时期,各国分立,攻伐征战不断。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在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的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生活、交通的困难与痛苦,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孔子的尊王和一统思想,正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这对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孔子从仁礼学说出发，特别重视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德”的作用，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的“德治”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他在《《论语·檀弓》》中感叹“苛政猛于虎”，主张“敛从其薄”，并且反对滥用民力，主张“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种主张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了“先富后教”和反对贫富悬殊、反对人殉制度等观点。认为只有既使人民富裕又施行教化，才能收到预防犯罪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孔子强调礼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刑罚不如礼德。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德化”与“礼教”却能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而不自知”《《礼记·经解》》。孔子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提倡的“德主刑辅”说。

(四)主张贤人治国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有关尚贤的言论很多，如：“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在这里，孔子把“举贤才”看作为政的一项基本原则，足见他对举贤极为重视。《《论语·颜渊》》中说，当权者如能知人善任，重用贤人，邪恶的人就难得逞，国家也就可以治理好。因此，孔子尽管没有完全摆脱“亲亲”的宗法原则的束缚，仍然赞同“近不失亲”，但出于需要士阶层参政的原因而讲又主张“远不失举”，对周礼的世卿世禄制度有所突破。同时，孔子强调当权者要严于律已，起表率作用。他对鲁国大夫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本意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端正。《《论语·子路》》说：“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已经意识到当权者为政的好坏与人民守法和犯罪之间的联系，犯罪的增加是当权者贪得无厌造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孔子一再强调当权者应该“修己以安百姓”。

(五)重“人治”，轻“法治”

孔子在对“人”与“法”的看法上，重“人”而轻“法”，极力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客观上贬低了法律的作用。《《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就是说，政事的兴废，取决于当权者个人是否贤明。贤者当政，政治自然清明。奸邪当道，政治必然昏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只能寄希望于道德高尚的当权者。认为国家的治乱，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这是孔子的“贤人治国”论或“人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孔子在《《论语》》中法律意义上的“法”字未提，四次讲“刑”^[5]。他虽然没有否定政刑的作用，但他显然是在扬礼德而抑政刑。也就是说，孔子不仅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而且也把礼德置于“法”之上。固然孔子所说的“礼”有时也包括“法”与“刑”在内，但当“法”与“刑”和“礼”的“尊尊”、“亲亲”原则发生矛盾时，他就不惜以法屈礼，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明显的例证。

(六)华夷一统，天下一家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从来不排斥夷狄。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孔子称赞夷狄国家的有序，并在比较中抨击周末的违礼僭乱。这是“夷”（进步了的夷）胜过“夏”（落后了的夏）的思想。《《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九夷这样的地方，由于“君子居之”等原因是能够赶上、超过华夏的，这是用夏变夷思想的流露。他认为夷狄和华夏谁为进步与发展的文明群体的顺序是在变化的，夷夏可变，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谁为进步和发展群体，谁就是文明的象征。夷狄有君，是学习了西周；君子居夷狄，夷狄不为“陋”，可见民族相互间的交流融合是夷夏变化的基础。这是关于历史进化的生动描述。同时，也包括着“严华夷之辩”（先进与落后之分别）的思想。孔子主张华夷一统，对一切有利于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人和事都予以充分肯定。关于桓公与管仲功过是非的评价，历史上众说纷纭，孔子及其弟子也褒贬都有，但对桓公与管仲在民族交流与融合方面的功绩，孔子是始终持褒奖态度的，并因此而减少对他们的批评。孔子关于民族可以变化和用夏变夷的思想、历史进化论的思想、“严华夷之辩”、“华夷一统”的思想等，虽然在孔子言论中看似不关联甚至相互矛盾，但稍加分析即可找到其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孔子的民族思想，是自古至春秋末期民族交流融合历史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和升华，对中华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作用。

(七)追求理想的和谐社会

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同老子相同，孔子也重

视人与人的和谐,即“以和为贵”,重在一个“和”字。如前所述,《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谈了治理社会的措施“礼”与表现其作用的“和”,以及“礼”与“和”的关系,说明了“和”的重要。儒家追求的“人与人和谐”,是“人”与人类社会应该体现“天道”的要求。由于人性本善,而人之善性来源于“天”之“至善”,如果人能充分发挥其善,而使之实践于社会,那么就可以把“天道”的要求实现于社会,使社会成为理性的和谐社会。儒家经典《大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把道德修养好了,人和人之间仁善相处,相互合作,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对建立在道德修养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这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和谐社会。

(八)视民为本

《论语》中,孔子纳“仁”入“礼”,是因为要使“庶人”知礼。多次谈到财、富的问题,是要“庶人”生活得好。同时强调取财为贵讲礼重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强调“庶人”要有财富,更要有礼。他告诫统治者要注意与民建立感情,应该“临之以庄”、“孝慈”、“举善而教不能”,从而得民“敬”、“忠”、“劝”(《论语·为政》);应该“简”、“居教而行简”(《论语·雍也》);应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应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应该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应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等等。

三、创见与影响

(一)关于仁礼学说

周公的“德治”思想给孔子提供了施“仁”于政的思想资料^[9]。孔子的仁礼学说,对“仁”、“礼”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系统而清晰的论说,纳“仁”入“礼”,使“仁”运用于社会政治而具体化,也使“礼”具有了“仁”的特征,更为丰富充实。孔子的“仁”是具有等差的博爱,这就不能没有“礼”的层次作为阶梯。孔子纳入了“仁”的“礼”,不也再是“不下庶人”的“礼”,而成为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有等次、追求“以和为贵”的“礼”。“孔子承周礼之统绪,由亲亲而言仁,由尊尊而言义,用正名分重新稳定君臣父子主从隶属关系,以仁释礼,对礼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9] 孟子和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两大巨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礼学说。两人都很重视“仁”和“礼”,但孟子着重在“仁”上,荀子着重在“礼”上。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1] 认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仁”,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同位和相通。可见,孟子把孔子、子思对“仁”的解释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孟子以“仁”为主体的仁礼学说,其运行方向基本上是由内向外:“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礼”,只能为“仁”外推的阶梯。孟子把“礼”看成了“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附件,当作为“仁”的一种表现为辞让或恭敬的外现。荀子强调“礼”和“人”的不可分离,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礼”,并注意到了人们之间的等差和分别。人们之间的等差和分别,正是人能群的根源。人能群靠有分,有分就靠仁义。有礼义之分就成为和,因和而有群。他认为礼义所规定的度量分界,是以节人之欲为手段来达到养人亡欲的目的。荀子以“礼”为主体的仁礼学说,遵循的是一条约己为“仁”的途径,与孟子的任己为“仁”的由内外推不同。荀子并非不重“仁”,也并非不要“仁”的外推。关键在于,荀子不认为“仁”是人自然而有的本性,“仁”是人的本性被约束或否定的结果,所以无从外推,只能约己为“仁”。因此他说:“人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荀子·大略》)^[8] 只有“仁心设焉”,才会“先仁后礼”。所以,必先约己、克己,然后再“仁”。认为仁义无节不成,“仁”之每一步外推同时也是“礼”的一次节制,仁礼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前进着。

(二)关于“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认为,只有使人的道德伦理都达到“仁”的境界,才能实现社会大治。因而朝着“仁”的目标,孔子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的。“天下归仁”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孔子从伦理道德入手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而深远,并且成为中国人观察判断政治事物、解决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思想,源自夏至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取了有关道德伦理与政治关系的思想观点。春秋战国的其他思想家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儒家学派对孔子的思想也不断进行

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谈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您们好！贵刊 2003 年第 1 期发表李伟等同志的文章《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及对策》，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问题。建议对策：1) 各级政府为就业市场的主导者。2) 各类用人单位要建立合理的用人制度。3) 各高等院校和毕业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必要的。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还有深层次的因素，最近我写信给《中国教育报》，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深层次因素。现寄上我的短信，供参考。

……

此致

敬礼！

张光斗

2003 年 4 月 12 日

《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您们好！贵报 2003 年 4 月 2 日发表记者文章《三大因素影响大学生就业》，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学历要求过严，三是专业不对路。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是表面的，还有深层次的因素。毕业生期望值过高，要高工

阐发。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思想的要素是重民，因而它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在思考和解决政治问题时，视人民为国家政治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后世儒家在孔子基础上又有新的充分的发挥。孟子在总结夏王桀、商王纣灭亡的教训时说：“桀纣失天下也，失民心一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从本质看，孔子开创的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为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

如前所述，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思想着眼于人的伦理道德。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为政在人”（人即“贤人”）；他认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他力主“举贤”，认为贤能之士为政，这样的社会才能安定。孔子这种思想，隐含着一个观点：“德治”必然伴随着人治，所谓“贤人”政治也不过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这一点，对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也是

资，要在大城市工作。这是因为城乡生活待遇差别过大，而内地和农村需要人才，由于生活待遇低，他们当然不愿去。为了贯彻“三个代表”指示，要逐步缩小城乡生活待遇差别。一般企业用人是宝塔形的，需要大专生最多，本科生次之，硕士更少，博士最少。但目前企业要高学历学生，博士你开价，硕士请坐下，本科能留下，专科你走吧。这是反常的……我们必须改革，加强创新，专业要对路，按人才需要使用人才，高学历、高科技人才，主要是为了技术和生产力创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职业性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素质教育。学生学了科技是为了应用，因此有毕业后工作岗位和就业问题。对各专业将来需要多少人要进行预测，预测要稍有超前。但不能把发达国家大学生与人口比，完全用到我国来，因为我国人口比发达国家多几倍，而工业没有他们发达。

以上认识是否有当，请指正。

此致

敬礼！

张光斗

2003 年 4 月 3 日

“德治”的致命弱点，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影响是消极的。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 蔡尚思. 孔子的礼学体系[A]. 陈其泰, 郭伟川, 周少川. 20 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63.
- [3] 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一辑[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4] 刘家合. 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A]. 陈其泰, 郭伟川, 周少川. 20 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99, 97.
- [5] 刘 新. 中国法律思想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刘志琴. 礼—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模式探析[A]. 陈其泰, 郭伟川, 周少川. 20 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113.
- [7]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8] 章诗同. 荀子译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责任编辑: 冯 蓉)